



喜庆活动与 村庄社会结构重组

■ 邓建伟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邓建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喜庆活动与村庄社会结构重组

责任编辑:龙仕林

装帧设计:彭戈

喜庆活动与村庄社会结构重组

邓建伟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文华印刷厂印刷

200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67,000

ISBN7-5438-2971-1

C·131 定价:25.00元

序（一）

几年前，本书作者邓建伟曾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时招收的博士生，转眼间竟已到了为他的博士论文《喜庆活动与村庄社会结构的重组》正式出版作序的时候了，真是可喜可贺。

写作博士论文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几位博士研究生在通过了答辩以后，都曾向我诉说，写作过程中经历过极为艰难困苦的“鏖战”。邓建伟能够顺利通过答辩，如今又能将论文付梓，期间所经历的“鏖战”和克服的困难，我当然是清楚的。博士论文的完成不仅需要学问功底的深厚，还需要有坚毅的奋斗精神。所以，首先对于邓建伟博士在人品和学问两个方面取得的成绩特表祝贺。

借此为邓建伟博士论文出版作序的机会，我也想顺便谈一下指导学生撰写社会学博士论文的几点要求；换言之，分析一下，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称得上是达到了社会学博士论文的水平。我曾多次向学生讲过，除去一般的标准外，即除去一般的学术规范、写作方法、语言文字、逻辑结构的要求外，社会学

博士论文应具备如下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该论文应显示，博士论文撰写者对于选题领域的文献有全面的掌握，也就是说，作者应熟悉前人或其他人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反之，如果出现了有某些重要的文献，博士候选人自己没有读过的情况，那么，该论文就不能说达到了博士论文的水平。

第二，论文要提出创新的、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其实与前面一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没有把论文答辩以前的文献通通看过，就不知道前人的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就不敢说哪一点思想是自己独有的、独创的。

第三，作为“社会学”的博士论文，还必须有实证调查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文献、资料、数据、个案方面，除了引证别人的材料外，作为博士论文，还必须应用社会学的方法完成自己的第一手的调查，社会学强调从社会事实中获取新鲜营养。这也是博士论文为学术研究所做的资料实证创新。我们知道，实地调查是费时、费力、费钱的。在国际上，为了做社会学的博士论文，用一年以上，甚至二、三年时间做 field work（实地调查）的并不罕见。所以说，完成一篇社会学博士论文，颇为不易。

从上述三个标准看，邓建伟的论文是符合要求的。邓博士在后记中说，他为撰写论文而准备的资料有 280 公斤之多，可见，作者在文献资料上是下了硬工夫的。邓博士发现，在改革以后的 20 余年时间里，农村中的包括喜庆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交往仪式活动变得十分频繁，邓博士提出，正是在这些仪式

活动中，村子里形成了区别于改革以前的新的社会分层，新的社会结构正是在村民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全书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至于第三个标准，实地调研部分，邓博士着力尤著。邓博士是在农村长大的，至今父母还在农村生活，邓博士对于自己家乡的情况十分熟悉。所以，几年前，在进入博士论文研究写作阶段，他提出准备回老家做长达一年的实地调研时，我是非常支持的。

我们知道，人类学和社会学有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叫做“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即通过长期与被研究群体生活在一起的方式来收集资料、了解社会、进行研究。其实，举个例子很好理解。我国五六十年代时，有一个词叫做“三同”，指要求干部下乡时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要求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大概与“参与观察”方式比较近似。

邓建伟的观察方法似乎比一般的参与观察还要深入一些，因为，他出生在本书所研究的这个村子里，从小在村庄长大，十几年的耳濡目染，似乎了解事物的深度比一般外来观察者要更为深入一些。

这样看来，所谓“参与观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研究者的参与，他们虽然可以做到全身心地参与，但毕竟不是社会群体的真实成员；第二种是，研究人员本来就生活在作为研究目标的社会群体之中，他们是社会群体里的真实成员；后来，由于角色变迁而成为所谓“社会学者”或“人类学者”，于是，凭借多年的生活经历，凭借特殊的人际关系，能够更为

“一体化”地融入被调研群体，从而实现了有目的的参与观察。

由此，笔者想到，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的 100 年里，中国社会阶层变迁跌宕起伏，出现了大量人群在不同阶级之间流动的现象，这使得不同阶级的人群之间有密切接触。远的不说，仅以改革以前为例，比如，反右以后的大批人员下放，“文化大革命”被批判、被打倒的人遣送原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居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口号下“下乡”当农民，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流动，均创造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交往的机会。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干部、知识分子、市民纷纷返城，这样，就造成在中国，第二种类型的参与观察的潜在人群尤其巨大，在全部人口占有相当的比例。笔者以为，好好挖掘这一段特殊的参与观察的历史，会发现巨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源。

如果比较一下这两种参与观察的方式，应该说，纯粹的外者参与，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研究者毕竟不是真实成员，对于事件体验的深度会大打折扣，有时候还可能发生误解^①。近来，在美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成为热点之一，一些纯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对于中国进行实地研究，虽然有的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的所谓“中国通”，但是，在对于中国一些问题的判断上，恐怕还得向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请教，以免判断失误。另一种就是象本书作者这样，邓博士从小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 月第 3-7、24-25 页。

就是在作为研究对象的社区中生活的，后来的研究包含了自己真正作为其中一份子的多年的体验和经验。当然，第二种参与观察，由于研究者本人就是群体中的真实成员，也要注意韦伯提出的“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问题。

说到这后一种体验，我本人从 80 年代初，涉足社会学，到新世纪初叶的研究，前前后后也有 20 年了，其间提出和企图验证一些社会结构方面的理论假设，撰写了一些学术论著，现在回想起来，凡此种种，均大大得益于本人早年的下乡体验和经历。本人与众多同龄人一样，在经历了两年的文革初期的学生运动以后，便于 1968 年暑期奔赴黑龙江农村，直到 1977 年返回北京，有大约 9 年的作为底层劳动者的生活体验。本人在 80 年代中期以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常常受到当年在农村地区的生活经验的启发。所以，似乎也可以将当年的下乡劳动权且算作第二种类型的参与观察。

借给邓建伟博士论文作序的机会，谈到以上一点研究体会，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了。

李 强

2002 年 2 月 5 日

序（二）

“三农”问题是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未来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近年来以“三农”问题为中心的论文和报道不计其数，诸如农民负担问题、民工潮问题、粮食问题和农民增收问题等都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十分关心的社会热点。农村问题如此重要，乃至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它又成了各位代表所讨论的焦点。朱镕基总理在本次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毫不讳言，当前我国农民的增收问题是总理最头痛的问题。^①看来，正确地解决“三农”问题，我们确实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如何从理论的高度来正确地认识它，这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迫切课题。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的面积广，人口多，而且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农民外出打工，

^① 见朱镕基总理于2002年3月15日上午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

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等现象的出现，农村问题也日益走向复杂化。我认为，在现实情况下，要正确地认识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我们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必须要有准确的理论视角。要能够准确地领悟到当今农民的社会生活与过去相比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关注的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尽管这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可是对于它们的准确回答却是我们正确理解农民的关键。理论工作者通过对这些关键性问题的把握，然后再从中提炼出一个准确的研究视角。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升华。这才是他们的独特贡献。第二，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要有较为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既要能够做到从理论的高度自上而下地俯视农民生活，又要求能够通过某一具体的农村生活事件来深刻地把握农民思考问题的独特眼光，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来将具体的农村生活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次。只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样两条路径相互贯通后，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理解才是透彻的、深刻的。第三，我国农村面积广、地形复杂，各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十分巨大。对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而言，要全面地了解农村，我想个案研究的方法是不可替代的。在社会学的历史上确曾有一大批杰出的社会学家都曾经从事过较为精细的个案研究。例如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等都是在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正是基于这些学者杰出的研究，才形成了当年朝气蓬勃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毫无疑问，在当今农村问题的研究中若能提供一些精致的研究个案，这依然是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

邓建伟博士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有着较深的农村生活经验。而且为了撰写本书，他又在导师李强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沉入”红村生活了年余的时间。通读全文后，我深切地感受到邓建伟博士的这篇论文是建立在较为艰苦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有感而作的，基本上符合前面所讲的研究农村问题的三个标准。与当前众多的研究农村问题的著作相比，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通过对红村司空见惯的喜庆活动的深入细致的描述，刻画出了在红村日益扩大的喜庆活动和村庄社会结构重组间的关系。具体说来，全书有以下几点特色：一、应该说目前已有多个案性的农村研究，但是多数还只是一种全景式的调查，邓建伟博士的这篇论文却专门考察了红村的喜庆活动，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人类学的题目，掌握、采用了大量的农民的生活实例和生动语言，方法得当，富有说服力。二、应该说对农村的喜庆活动进行研究并从中透视社会结构的做法，并非从本书开始。但是，以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对喜庆活动的系统研究来分析农村的职业、地位分化，却是本书的新意。一方面，它将农村喜庆活动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分化向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也给出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读起来耐人寻味。三、本书中创建的“生活理性”概念补充、替代了以往文献中农民“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等理论假设，独辟新径，自成一说，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含义，有较信服的解释能力和涵盖作用，理论视角新颖。应该指出，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模式并不是观察当今中国农村各种复杂现象的仅有钥匙，但本书确实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农

村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这种比较全面、准确的描写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意义,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农村制度、结构变化的轨迹、趋势是很有启发的。

作者对喜庆村庄内在结构的社会学分析是本书的精华部分。作者在该章指出,无论是市场关系、组织关系、工作关系等次级关系,还是亲属制度、亲缘关系、朋友关系等初级关系,均无法说明喜庆村庄中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生活重心。为此,作者特提出“喜庆关系”的独特视角来具体、深入地认识喜庆村庄所有效运作的社会框架,从而为理解将传统和变革熔于一炉的农民行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转型期的村落社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典型。

作者在本书中对村落社区的研究有不少创新见解。比如作者建构了“喜庆村庄”的概念,提出了关于农民“生活理性”的假设,“深度描写”了制度转型中的农村结构重组,并在对村民喜庆活动的叙述中再现了村民工具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再建构过程等等。作者将这些创新的概念以农民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故事联结起来,揭示了农村在当前转型期的某些巨变和未变的深层社会结构,确有其特有的深刻之处。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作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非常了解邓建伟博士的工作和求学经历。邓建伟于1992年7月调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当时的名称是民政部长沙民政学校)工作,至今正好10年的时间。现在他邀请我为他的论文出版作序,这不仅使我想起了“面壁十年图破壁”、“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等治

学格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在这10年的时间里，已有一批年轻的学者正在成长。他们不畏艰辛，在教学和科研的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他们有的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爱岗敬校。我感觉到他们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最为宝贵的财富，也是学院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我相信，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也一定能够为更多的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刘 晓

2002年3月22日

目 录

导论：喜庆活动与喜庆村庄的建构·····	(1)
一 喜庆活动与农村社会·····	(1)
二 喜庆村庄：乡村社会结构在喜庆活动中的重组 ·····	(5)
三 作为叙述架构的喜庆活动·····	(11)
四 调查地点的进入与调查方法的选择·····	(16)
五 本论文所提出与试图论证的主要假设·····	(23)
 第一章 “生活理性”与喜庆活动·····	(25)
一 问题的提出·····	(25)
二 “生活理性”：关于村庄生活世界的基本假设 ·····	(27)
三 “生活理性”的优越性及其在我国农村研究 中的具体运用·····	(38)
四 喜庆活动、喜庆村庄与生活理性·····	(53)
五 喜庆活动与村民的“常识的思维”·····	(70)
六 简短的结论·····	(77)

第二章 作为“喜庆村庄”的红村	(81)
一 对以往几种村落文化模式理论的回顾.....	(81)
二 红村“生活世界”的变迁与喜庆村落的兴起	(91)
三 红村的喜庆活动与村落.....	(110)
第三章 喜庆村落中的几种主要喜庆活动	(126)
一 通过仪式、大农业民俗与喜庆活动.....	(126)
二 喜庆村落中的几种主要喜庆活动.....	(142)
第四章 喜庆村落的内在结构	(167)
一 结构二重性理论与喜庆村落的内在结构.....	(167)
二 喜庆村庄的标志.....	(189)
第五章 喜庆村落中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	(216)
一 喜庆关系的提出.....	(218)
二 喜庆村庄中的喜庆关系与乡村经济发展.....	(240)
三 “深描”: 喜庆活动与村庄的社会结构分析.....	(256)
第六章 喜庆活动与村庄的运行	(305)
一 喜庆村庄中属于村庄层次的喜庆活动悄然兴起	(306)
二 喜庆活动与传统村庄的角色转换.....	(320)
结论及启示	(335)
后记	(364)



喜庆活动与喜庆村庄的建构

一、喜庆活动与农村社会

本书是关于中国南部一个村庄中农民的喜庆活动与农村社会结构变动之相关性研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中的喜庆活动办得越来越热闹：不仅出生礼、婚礼、葬礼等各类人生礼仪的操办规模越来越大，还有各类名目繁多的寿礼，如六十寿、七十寿和八十大寿等等，农民似乎一有机会就要宴请宾客，举行庆贺活动。甚至村庄生活中的一些日常事务，诸如子女升学、家中新添置了摩托车、小汽车等家居生活中的耐用消费品，村民们也要借此机会燃放鞭炮，热热闹闹地摆上几桌。近年来，盖新房的农民也越来越多，从拆旧房到盖新房的整个过程尽管十分辛苦，但是农民始终没有忘记将盖新房这一过程纳入到喜庆活动的轨道中来。有些传统性活动，如正月里耍龙灯、春节拜年等，这些活动本来对于生活在村庄中的每家每户来说都是不能绕开的，甚至是不能漏掉的，可是近年来它们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玩法：如耍龙灯时出现了“玩点户”的办

法，春节时原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初三初四拜地方”，拜地方时往往是从村头拜到村尾，谁家也不会漏掉，可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再像原来那样从村头拜到村尾了，而是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找几户属于“好户”的家庭拜拜就算是完成了拜地方的任务……从客观的角度看，这些喜庆活动为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创造了农民个人、家庭及农村社区完成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社会空间，然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却在于：农民的这些喜庆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和诠释农村社会中农民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有效途径。

笔者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在农村社会中长大，应该说对农村社会中的这些喜庆活动并不陌生；但是如今，当我为了完成学业论文，围绕着农村社会中的喜庆活动这一选题再次回到原来所生活的村庄中进行社会调查时，却发现与原来相比，农村中举办喜庆活动的初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有一次，笔者参加了村庄中的一次葬礼，发现原来举办葬礼时的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已经完全没有了，阴阳先生进行道场活动时显得有气无力，围观的人也寥寥无几。笔者当时以为是人们都很累了，没有精力来进行各种法事活动了，可是当法事进行到“亲友告别”这一程序时，却发现不仅所有的孝子都到了场，而且参与该丧事的所有工作人员也在总管先生的率领下来到了现场围观和捧场，阴阳先生顿时精神焕发，赶走了瞌睡虫，借此机会十二分卖力地唱起各种曲调来赞美孝子，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孝子，更是其大加夸奖的对象。而且其赞美之词既符合事实，又琅琅上口、让人百听不厌，显然还具有社会激励作用。总管先生和围观群众在旁边不断地为阴阳先生提供各种孝家可以大放光彩、表明其社会地位的家庭档案材料。其场